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



东亚合作论坛·第三辑

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

中国新外交·中日关系·东亚合作

China's Reform & Opening-up
and East Asi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



东亚合作论坛·第三辑

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 中国新外交·中日关系·东亚合作

China's Reform & Opening-up
and East Asia



社会 科学 文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中国新外交·中日关系·东亚合作/
黄大慧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5
(东亚合作论坛·第3辑)
ISBN 978 - 7 - 5097 - 1458 - 4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改革开放 - 中国 - 交集 ②中外关系 - 东亚 - 交集 IV. ①D61 - 53 ②D822.33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469 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

东亚合作论坛·第三辑

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

——中国新外交·中日关系·东亚合作

主 编 / 黄大慧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编辑 / 邹东涛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高明秀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宋浩敏

责任校对 / 谢 华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5

字 数 / 329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458 - 4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 岳 黄大慧 黄嘉树 金灿荣 李宝俊
李景治 时殷弘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黄大慧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保健云 方长平 郭春生 韩彩珍 黄大慧
李庆四 刘东国 田 野 王星宇 徐 莹

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代序）^{*}

纪宝成^{**}

在我们庆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喜庆时刻，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东亚合作论坛 2008：改革开放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里隆重举行。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对光临本次论坛的各位嘉宾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1978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 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与东亚各国开展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中国的负责任大国态度使东亚一体化事业在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领域蒸蒸日上，中国的经济飞速稳定发展尤其使东亚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展现出了强大的抵抗力和生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对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本次论坛以“改革开放与东亚”为题可谓恰逢其时。

*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办“东亚合作论坛 2008：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国际研讨会上的致辞，标题为编者所加。

**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目前，东亚是与北美和欧洲并列的世界三大经济繁荣区域之一。在这里，既有发达的日本和韩国，同时又有迅速崛起、备受瞩目的中国。东亚国家的共同命运感和合作意识不断加强，东亚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之下，东亚的经济稳定和安全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此外，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各个国家的边界领土和能源争端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依然还在影响着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在这样一个合作与竞争同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地区，我们如何相互借鉴学习，如何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构建一个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宗旨的和谐东亚，是东亚各国政治家和学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构建和谐东亚，离不开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良性互动，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与磋商，也包括各国学术界与民众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2008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三十周年，这注定赋予了这一年以崭新非凡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研究型大学，始终关注和发挥人文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同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研究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有力的智力支持。

当然，中国人民大学也十分愿意与国内外学者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

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都是各国学术界的精英，我深信在未来两天的思想碰撞和砥砺中，大家一定能够围绕“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这一主题，贡献自己的真知灼见和学术成果。

最后，我再次对各位能够光临中国人民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祝大家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目 录

CONTENTS

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代序） 纪宝成 / 1

第一部分 中国发展经验与中国新外交

中国改革国际比较及其特性 金灿荣 / 3

中国特色改革和发展的意义

——成为一种新发展范式的可能性及其

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韩] 全圣兴 / 10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战略思想

——意识形态基础、根本纲领和当今挑战 时殷弘 / 2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的发展及主要成就 李景治 / 25

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 王 帆 / 35

从“新安全观”到“软实力”：集体认同的

形成还是分化？ [韩] 车昌勋 / 40

新世纪中国民间外交研究：问题、理论和意义 张胜军 / 48

逐渐走强的中国应形成大国思维 张敏谦 / 58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 张小明 / 62

四川大地震与灾害救援国际合作之展望 [日] 大嶋英一 / 79

第二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发展三十年	黄大慧 / 87
中国的发展与中日关系	孙 承 / 95
人民币与日元：对手还是伙伴？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与中日关系的新课题	刘军红 / 106
中日防务交流：进展及课题	于铁军 / 113
中日经贸关系：从“民间促进”到“战略互惠”	李光辉 / 123
略论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高 洪 / 130
步入全新阶段的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动因与态势	江瑞平 / 136
改革开放政策是中日关系继续发展的重要依托	周颂伦 / 148

第三部分 东亚合作中的东北亚与东南亚

日中韩三国间合作的障碍及其克服	[日] 高原明生 / 157
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	徐万胜 / 165
韩中青年反中、反韩情绪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韩] 金珍镐 / 173
论中国东亚地区战略的展开	门洪华 / 190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选择	
——基于 APEC 和 CAFTA 的比较分析	田 野 / 206
建构主义视角下审视东盟的对外关系	
——以东盟与中国、日本、印度关系为例	张 云 / 217
小马拉大车？	
——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	翟 崑 / 240
从知识社群到东亚共同体	方长平 / 249
中国改革开放与蒙中经贸关系	[蒙古] 那·图木尔 / 254

第四部分 金融危机与东亚地区合作

金融危机与东亚地区合作	庞中英 / 261
东亚金融合作：政治影响与展望	[韩] 金晋英 / 270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日的冲击	[马来西亚] 林华生 / 275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日节能环保合作的 现状与潜力	朱 宇 筵志刚 / 288
后 记	/ 299



第一部分

中国发展经验与中国新外交

中国改革国际比较及其特性

金灿荣 *

一 中国与苏联的改革比较

中国的改革，发生在一个革命后的社会，中国进行的改革比较理想的参照系，应当是同样发生在革命后的社会的苏联的改革。从这个比较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某些特性。

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进行了一次比较认真的改革，但总体而言这个改革并不成功。比较起来，中国的改革，时间更长，取得的成果也颇丰，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由以下几个特性决定的。

第一，中国的改革是面向市场的有明确目标的改革。

邓小平同志曾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中国的改革，但实际上中国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目标是清晰的，“过河”的彼岸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如何到达这个彼岸，尚无定论。苏联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是没有目标的，它只是在原来的计划体系内将其更加完善。这是第一个特性，即我们的改革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苏联没有。

第二，中国的改革是伴随着开放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伴随着开放的，是对苏联改革模式的突破。而苏联的改革就是单纯的改革，没有伴随着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苏联的改革是

*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体系是开放的，心态是开放的，那么就有学习的可能，学习外来的经验，从而导致创新；如果是单纯的、关起门来改革，那么就只是技术上的改革，不可能有制度上的创新。

第三，我们的改革不是单一主体改革，而是多主体改革。

苏联的改革主要依赖的是中央政府的技术官僚，苏联中央政府牢牢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苏联的改革，只有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反观中国的改革就不一样，中国的改革，至少有五个投资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资以及城市个体户和广大农民，这一点是中国改革最大的、最特别的和最有意义的一个特性。苏联的技术官僚是非常优秀的，尤其是斯大林时代的技术官僚，他们可以媲美二战后在日本国内崛起的技术官僚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新加坡的技术官僚。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们利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使苏联完成了西方需要一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从而为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老子曾经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斯大林时代优秀技术官僚之“福”在赫鲁晓夫改革时代就变成了“祸”。赫鲁晓夫的改革完全依赖于中央技术官僚，从而导致苏联的改革就只有中央这个单一主体。而中国在邓小平 1978 年启动改革之时，则认为中央的干部队伍是无法依赖的。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中央的干部队伍专业知识不够，无法适应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二是在邓小平看来此时的中央干部队伍还不可靠，是“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邓小平曾说过：“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① 而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形势非常严峻，改革迫在眉睫，必须马上启动。在这两重因素影响下，要改革只能放开，中央政府放权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来处理改革事宜，此其一。其二，改革伴随着开放，开放的一个具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37 页。

体表现就是引进外资，因此外资就成了改革的另一个主体。其三，改革是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① 这使得中国9亿农民也成为改革的主体，9亿农民成为改革主体则带来了中国工业化的特殊现象——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小城镇化加速，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色人群，这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是第一例！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陆陆续续返城，返城人数大约有1500万，如此庞大的人群涌入城市，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后知青返城，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城市里突然间涌入了近2000万人，这些人有合法的城市身份，但是城市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这种状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政治家眼中很可怕的一种压力。为缓解这种压力，政府放宽对个体户的限制，于是个体户便成为改革的第五个主体。以上便是我概括的中国改革的五大主体，这种多主体改革导致今天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多元的社会看上去很乱，主要问题也很多，但多元社会非常具有活力，而且力量充足，这也是中国今天真正的力量所在。

第四，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总体来讲走的是增量改革的道路，不是直接摧毁原来的制度，而是在以前成就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市场因素、国际因素、现代的和专业的因素，这种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就是西方人常说的费边主义道路改革。这与苏联不一样，苏联的改革是全盘否定式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然后再进行改革。这种全盘否定的方式受到很多激进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代价也很大，反弹也很厉害。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改革应该以渐进主义为主，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当采用激进手段。

以上便是中国改革的四大特性，除此之外中国的改革跟苏联相比还有几

^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具体形式有：（1）包干到户，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全部归农民自己所有；（2）包产到户，实行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超产归自己，减产赔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个客观条件的不同。

首先，中国改革的起点是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很容易达成脱离“文化大革命”灾难，走向一条新路的政治共识。此外，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管理方式投入很高，产出相对较低，效率很低，因此改革初期在管理方式上的改进能够迅速显现成果。而苏联实际上是把计划体制的内在效益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要继续提高却比较难，很难见成效。

其次，国际因素。这主要是指美国因素。苏联改革初期的1956年是美苏冷战高峰，美国把苏联作为主要对手，盯得死死的，苏联此时开放的国际空间非常窄，而中国在1978年改革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寄予了某种希望，对中国的改革态度是比较开放的。因此中国改革的外部条件要相对好一点。

最后，技术性的外部条件。中国有港澳台的窗口以及海外的几千万华人华侨，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与外部沟通的桥梁，这个条件是苏联没有的。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并逐步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上文讨论的在国际比较视野下探索出来的战略选择以及相对有利的外部条件，也是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改革比较

人类社会的变革所能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改革或称改良；二是革命，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到无法调和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三是搭便车。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搭便车肯定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大国变革采取的方式主要还是改革或革命。中国在20世纪既有改革又有革命。中国革命完全可以媲美美国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改革可以媲美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在二战后的历史中，由于科技进步以及意识形态定型，大国内部发生革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二战以来，大国变革的主要方式还是靠改革。战后许多国家都进行了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改革、苏联的改革和美国的改革。

美国之所以能够赢得冷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成功地改革了经济运行方式，适应了新阶段工业化的挑战，即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向信息化转轨。冷战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改革是否成功，苏联因改革失败而输掉了冷战，美国因改革成功最终击垮了苏联。苏联在斯大林之后开始改革。斯大林的极端统

治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使得苏联的改革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反思的基础上的，但遗憾的是苏联的改革只进行了8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勃列日涅夫统治了18年，这18年是苏联改革的瓶颈期，改革几乎停滞，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改革重启，但此时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很难调和的程度，改革的各项条件更差了。因此整体评价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失败的结果就是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在冷战早期美国是处于守势的，1946~1956年苏联启动改革之时，美国仅有的优势是客观条件上引导着西方阵营，占领的地方多，积累的财富多，力量比较大。但是从两方博弈而言，1946~1956年这十年间，苏联阵营是呈进攻态势的。从比较当时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苏联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美国；在科技创新上，苏联在人造卫星、洲际导弹等方面领先于至少不逊于美国；在政治上，受国际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新兴独立国家在立场上都偏向于苏联，都把矛头指向美国阵营，当时的中间路线或中间地带都是偏东方的；在意识形态上，东方阵营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国加入东方阵营，都是美国处于防守态势的表现。另外，当时美国国内缺乏自信，对共产主义充满了恐惧，突出表现就是麦卡锡主义。正是由于美国社会集体不安全感的增加，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和压力缺乏自信，才为麦卡锡主义滋生提供了土壤。再则，在当时东西方对抗过程中，东方一直标称民主国家，而西方号称自由世界，民主和自由是分开的、没有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很多国家开展民主选举反而证明了东方阵营民主的合法性。在军事上，当时美苏主要围绕中欧，进行军事对峙。苏联是一个强大的陆路国，美国无法化解苏联强大的坦克集群在中欧的压力。在东方战线，双方在朝鲜交手，美国也没有占到便宜。因此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①通过核威慑来遏制苏联从而弥补其在常规武器上的颓势。总而言之，在冷战的头十年，冷战的胜负是不明朗的。

^①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的一种军事战略。朝鲜战争的失败使美国政府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要在世界各地维持庞大的地面部队在经济上力不从心。1953年，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不久即着手制定“大规模报复战略”。1954年1月12日，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演说，公开而详尽地对“大规模报复战略”进行阐述。他宣称，美国目前的基本决定主要依靠一支庞大的报复力量，它能够用美国选择的武器在美国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这一战略主要把赌注压在核武器上，主张削减常规兵力，重点扩充核导弹力量和战略空军，在外交上提出要执行比杜鲁门的遏制政策更有力、更主动的“解放”政策，即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出来。

冷战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东西方阵营内部都出现了各自的问题。苏联集团的经济逐渐缺乏活力，集团内部出现离心离德，比如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有脱离苏联倾向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苏联的改革面临了很多外部压力。同时美国也面临了来自西欧和日本的外部压力，尤其是欧洲的复兴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但是总体比较，整个 60 年代，苏联是相对稳定的，而美国更多的是面临了许多来自国内的压力，比如妇女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嬉皮士文化运动等。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美国果断进行了改革，用和平的方式，以政治和法律的手段，自上而下对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了调整。这个过程美国大约用了 20 年的时间，可以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为 20 世纪 70 年代的政治性改革。这主要是指在政治上，主流社会对非主流社会（特别是黑人）采取开放的态度，向非主流社会提供支持；在法律上废除各种各样的带有种族歧视的法律，代之以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① 同时注重保护民族精英，开始重视包括妇女、老人、残疾人在内的传统弱势群体；在文化上，出现了多元文化，在社会生活里加强了社会融合。总之，在 70 年代，美国的政治安排、文化内涵、法律制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成为美国从 20 世纪向 21 世纪跨越的一个分水岭。在 1960 年，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想象 40 年后会出现一位黑人国务卿，更不用想象在 48 年以后可能出现一名黑人总统，而这一切都源于美国 70 年代的改革。

第二步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领域。经济改革主要是 80 年代的里根改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打压工会，尤其是对工会罢工进行严厉镇压，从而降低工会组织在经济中的作用，客观上增加了美国经济的活力；二是里根政府放宽各种各样的政府管制（deregulation）——尽管这一做法在当今被普遍看成是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的肇因；第三个方面是金融创新，里根时期有战略家提出美国要跳出制造业的周期约束，通过建立美国的金融霸权来摆脱生产的周期，并让别国的制造业为其所用；最后一个方面来自美国企业的内部转型，美国企业通过管理的改进、新产业的创设，通过大批的裁减员工来缓解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压力。

^① “平权行动”是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 1965 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民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受的委屈折算成现实的利益。